

技术中的伦理召唤：论《焦虑是自由引起的眩晕》中科技的审判功能

董威 盛世强

云南民族大学，云南昆明，650504；

摘要：本文以特德·姜的《焦虑是自由引起的眩晕》这一中篇小说为研究对象，探讨了科技在小说中的伦理功能，尤其是棱镜技术如何影响个体的道德意识与行为选择。通过技术决定论的视角，文章分析了棱镜在该小说中如何构建一种道德反思机制，将伦理判断交由技术裁决。进而结合祖博夫的监控资本主义概念，揭示了技术如何重塑信任与道德责任；并探讨作者如何通过科幻叙事，引导读者在角色的选择与反思中进行自我道德审判。文章最后讨论了技术叙事的伦理效果，强调虚构文学在伦理意识塑造中的重要作用。

关键词：技术决定论；行为反思机制；赛博伦理；延迟正义；道德投影

DOI：10.64216/3080-1516.25.02.044

引言

在当代科幻文学中，技术不再只是人类意志的延伸工具，而逐渐演化为一种引发深层伦理思考的存在。在当代英语科幻文学中，特德·姜（Ted Chiang）以其独特的写作风格和哲学深度赢得了广泛赞誉。他的作品以短篇为主，精炼而深邃，常被视为“思想实验的文学表达”。2019年出版的小说集《呼吸》（Exhalation）是他于2019年出版的第二部短篇小说集，也是继《你一生的故事》之后备受期待的作品，延续了他一贯的创作特质，在延展科技设想的同时，深入探讨了意识、自我、伦理、自由意志与人类命运等重大哲学议题。该集共收录九篇中短篇小说，包括《商人和炼金术士之门》《呼吸》《软件体的生命周期》以及《焦虑是自由的眩晕》等，其中既有借助奇幻设定对因果律与时间的冥想，也有基于人工智能与平行宇宙技术对道德选择的探问。

《呼吸》一书以其跨越哲学、神学、人工智能和认知科学等多学科的视野，展现了科幻文学不只是对未来的想象，更是对现实世界中人类处境的深刻反思。特德·姜笔下的“技术”不仅是一种工具或背景设定，更是揭示人类内在困境和价值张力的道德装置。本论文将聚焦于小说集中的若干篇章，探讨其中如何借由科幻设定审视自由意志与伦理责任，尤其是在现代科技与资本结构不断渗透个体生活的背景下，人类如何面对“自由的眩晕”与“数据的枷锁”。收录在其中的中短篇小说《焦虑是自由引起的眩晕》构建了一个基于量子叠加原理的棱镜装置，它能揭示使用者在另一个平行世界中的不同选择。技术所带来的不再是对现实的控制或对未来的预测，而是对“我是谁”这一命题的持续拷问。本文认为，《焦虑是自由引起的眩晕》中最具哲学深度的设

定，不在于科幻技术本身的奇异性，而在于棱镜所激发出的伦理机制。这一装置不仅揭示了人的行为选择具有不可回避的道德含义，使被忽视的责任、被压抑的悔恨与被延迟的正义得以暴露与放大。小说借助这一技术装置，以赛博伦理的方式完成了一场现代版本的审判场建构，而这一审判并非来自法律、宗教或社会规范的外部约束，而是源自个体内在的伦理意识被技术所激活。技术在此已不仅仅是冷冰冰的中性工具，它成为一种伦理引擎，一种重新组织人类道德责任的结构性力量。“焦虑是自由的眩晕”出自哲学家克尔凯郭尔（Søren Kierkegaard），原文是：“Anxiety is the dizziness of freedom.” 它的意思是：人在面对彻底自由的选择时，会因意识到自己对结果承担全部责任而感到焦虑——就像站在悬崖边向下望时感到的眩晕，不是因为恐高，而是因为知道自己随时可以跳下去。焦虑则是自由的现实性，是可能性的可能性。与传统技术乌托邦或技术恐惧论不同，特德·姜在小说中并未给出明确的价值判断，而是提供了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思维实验场——在这场域中，读者被引导去反思：若所有未被选择的“我”都以另一种形式存在于世界中，我是否能真正逃避悔恨、否认责任、放弃信任？

1 棱镜的凝视

在《焦虑是自由引起的眩晕》中，特德姜构建了一个看似微小但深具伦理颠覆性的技术装置——棱镜，它并不直接改变现实世界，却深刻改变了人类的道德认知结构。通过这个装置，用户可以与另一个平行宇宙的“自己”短暂通信，交流内容由使用者自由决定，但信息仅限当下，无法追踪其后果。这个设定打破了道德判

断的传统前提：人的选择不仅是独一无二的，而且是可被镜像比较、对照、质询的。在小说中，人们使用棱镜时，往往倾向于通过指出平行自我更糟糕的行为来为现实中的自己辩解，而很少有人借由平行自我正常甚至优秀的表现来为自身辩护，这一点令丹娜感到惊讶。故事结尾，丹娜收到一个匿名寄来的包裹，里面是一台平板电脑，存有几段视频，内容是她的多个平行自我讲述自己关于文妮莎被留校察看的那段往事。那件事曾令丹娜长期感到愧疚，因为她记得自己为了自保而将全部责任推给文妮莎，导致后者受到惩罚。然而，在视频中，无论是哪一个版本的丹娜——是独自承担了全部错误，还是与文妮莎共同分担责任——文妮莎最终都走上了违法犯罪的道路。

传统道德哲学强调“意图—行为—后果”的闭环逻辑，但棱镜打破了这一时序。它所显现的不是实际后果，而是潜在后果的视觉化。换言之，技术成了一种伦理的照相机，使人无法回避选择背后的道德张力。在棱镜的结构中，每一次通信行为都在提示：另一种你做出了不同的选择。这对个体形成巨大的伦理拉扯。“我一直在想，要是我没说止痛药是我的，一切就会不同。如果我让文妮莎一起分担责任，我们之间就不会产生嫌隙，渐行渐远，我们会一起受罚，她就不会开始结交那些问题女孩，会走上完全不同的生活之路。”（姜，327）这不是对技术的不满，而是即使知晓更好的选择，也无法完成心理与行为上的跃迁。这种情境可以视作一种对技术伦理的反讽，人类被迫面对伦理真相，但技术并未提供路径，只留下判断与悔恨的重量。

由此，棱镜技术本质上不是信息中介，它将人类原本模糊的内疚、恐惧、未竟之愿具象化，使之呈现在他者的面孔中。而这个“他者”恰恰是另一个“我”——这强化了伦理冲击，因为责任不再是抽象的社会约束，而是自我对自我的审判。因此，棱镜的真正功能不是提供信息，而是以可能性诱发反思。它代表了一种赛博伦理中的新趋势——技术不是为了解决道德困境，而是制造一种无法回避的道德凝视。

2 选择的回响

在《焦虑是自由引起的眩晕》中，最具震撼性的伦理问题之一，并非是“我是否做了正确的选择”，而是“我是否该为我未曾做出的选择承担责任”。这种心理状态并非源于现实时空的直接后果，而是来自棱镜所揭示出的另一种可能所带来的回响效应。

正如小说后记中所写：“在有关自由意志的讨论中，很多人说，所谓你可以自由选择的行为——由你承担道德责任的那个行为——意味着在完全相同的条件

下，你必须拥有作出不同选择的能力。”（姜，328）这一句道出人类在面对多重世界信息时所无法回避的道德责任。人们开始为缺席的选择感到内疚，为回避的行动感到羞耻。这种道德压力体现了一种新型的伦理机制：技术使人类道德判断的时间维度不再是单线性的因果链条，而是向前与向后不断折返、补偿与想象的网络结构。在这个结构中，正义被迫延迟，道德反思也变得滞后而持续。换句话说，棱镜引发的是一种他人痛苦先于自我行为发生的悔恨机制。这种机制呼应了哲学家亨斯·约纳斯（Hans Jonas）在《责任原理：技术文明时代的伦理学探索》中提出的观点：“人类要对他自己、对他遥远的后代乃至他所统治的全部地球生命负责”。（Jonas, 1984）。而棱镜恰好提供了未来之镜功能，它以信息的方式将后果提前显现出来，让人无从逃避。

进一步来看，这种延迟正义并未真正实现救赎，反而激发了更深的焦虑与存在性撕裂。“别的视频没有提到因为止痛药被抓的事件，但也都遵循一种可以识别的模式。一条视频里，丹娜因为把文妮莎介绍给一个引诱她吸毒的男孩而内疚；另一条里，一次成功的商店行窃促使文妮莎尝试更多大额盗窃。所有这些文妮莎都陷入自毁性行为模式中，不论采取了什么措施，所有的丹娜都为此感到自责。”

（姜，327）在此，正义不再是一种清晰的规范目标，而是一种自我欺骗式的希望机制。这种伦理异化现象，也正是特德·姜小说中反复揭示的隐痛之一：技术不断揭示道德问题，却并不能提供解决方案。

3 信任的重构

在《焦虑是自由引起的眩晕》一文中，棱镜技术不仅仅作为一个信息传递工具存在，它实际上承担着审判者的角色。通过让用户与自己在平行宇宙中的其他版本对话，棱镜改变了人类在道德判断上的自主性与责任感，事实上，它正在逐步将伦理审判外包给技术系统。棱镜不仅仅影响人的选择，它深刻影响了个体的道德判断方式和信任机制。棱镜可以看作是一种软监控技术，它不仅通过信息收集和分析来指导个体行为，还在伦理层面上对用户进行无声的控制。根据哈佛大学商学院教授肖莎娜·祖博夫（Shoshana Zuboff）的描述，监视资本主义由利润驱动，出现于 Google Ads 为首的广告公司看到个人信息能用于更准确地定位消费者之际。（Zuboff, 2019）资本主义下的经济压力正在加剧线上连接与监控机制的强化，企业不断渗透进人们的生活空间，意在牟利或规范个体行为。在定向广告成为可能之后，个人数据点的价值随之上升。随着数据价格的上涨，社会中最富有群体在购买个人数据点方面的优势也逐渐受

到限制。

棱镜的操作模式正是这种监控资本主义的体现。它通过揭示其他版本的可能行为,实际上将选择的责任从个体的良知转移到了技术平台上。小说中丹娜在使用棱镜时,她不仅在寻求一个关于“我是否做错了”的答案,更是在主动将自己的道德判断交由技术做出决定:“我一直在琢磨,要是我没有坦白,一切是否就会不同。那样险些被抓足以警醒她不要陷入真正的麻烦,她开始惹祸就是因为生我的气,要没有那件事,她会上好大学,生活也会完全不同。”(姜,327)

在棱镜的世界中,人类的信任机制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技术的介入让个体开始相信另一个自己的行为与选择能为当前决策提供绝对的道德指引。监控资本主义不仅在改变我们如何理解他人,还在逐步改变我们如何理解自己,当权力通过信息的流动形成对个体的控制时,个体的信任不再建立在人与人之间,而是基于对技术的信任。在这一过程中,技术不仅提供了数据化的反馈,也将选择的后果外化,使得个体的道德行为依赖于技术平台的评估与判断。个体将自己和他人之间的伦理判断交由技术系统裁决,逐步形成对技术的依赖,并让技术成为新形式的伦理法庭。文中“某些个人在了解他们的平行自我享受了他们没有企及的成功变得消沉。”

(姜,293)这种情节揭示了一种深层次的伦理异化,这种体验不仅没有带来道德的提升,反而让用户越来越迷失于技术的反馈中。

4 技术叙事的伦理效果

在《焦虑是自由引起的眩晕》中,棱镜不仅仅作为一种技术工具推动了情节的发展,它还以独特的方式构建了一个审判场,让角色和读者都在不同的伦理维度中进行自我反思。棱镜的技术本质不仅限于信息的提供,更在于通过构建平行世界的机制,让读者和角色在其中不断反思道德抉择。通过这种叙事设计,读者通过角色与不同自我的对话,产生了一种“如果我是他”的移情作用,从而反思自身的道德行为。

棱镜的作用不仅仅是作为一个预测工具,它还让角色和读者通过反复试探不同选择的后果,反思自己可能的行为。在小说中,角色们通过棱镜与自己在平行世界中的“另一个我”对话,逐步发现不同选择可能带来的后果。这种结构通过展示多重可能性,让个体在技术系统的引导下,重新评估自己的选择和道德责任。棱镜构建的多维度世界并不是单纯的故事背景,它更像是一个伦理的实验室,让人类通过模拟不同选择的结果来进行自我审判。棱镜的技术机制让角色的行为成为对读者道德意识的镜像,通过阅读这些角色与不同版本自己的互

动产生道德移情。这种移情作用的核心是让读者体验到角色面临的伦理选择以及其后果。芝加哥学派(又称“新亚里士多德学派”)第二代人物韦恩·布斯(Wayne Booth, 1921-2005),曾在其代表作《小说修辞学》中非常严肃地讨论了小说叙事技巧与伦理关系,揭示了虚构性的文学修辞与小说家的道德责任之间的潜在关系。布斯强调:“我们所说的大部分文学作品不但有潜在的伦理意图,而且明白无误地就是要唤起伦理回应。”(Booth, 1988)棱镜的多重世界不仅让角色面对道德选择的后果,也让读者通过不同版本的角色体验到道德移情的过程。读者在这种移情过程中并非是冷眼旁观者,而是道德审判的参与者。在这种情节结构的推动下,读者被迫参与到反思中,进而质疑自己的道德选择,提升自身的伦理意识。《焦虑是自由引起的眩晕》正是通过这种方式,让读者和角色之间的伦理鸿沟不断消解。通过棱镜,技术不仅成为了故事中的叙事工具,也成为了对读者道德判断的镜像反射。

5 结语

通过《焦虑是自由引起的眩晕》的分析,本文揭示了科技与道德之间的深刻联系。棱镜作为审判装置,不仅影响角色的道德决策,也通过叙事的伦理投影作用,引导读者反思自身的行为与责任。科技在此并非单纯的工具,而是成为道德判断与伦理选择的催化剂。随着技术对人类行为的渗透,未来的伦理问题将愈发复杂,这一研究不仅为科幻文学中的伦理探索提供了新视角,也为我们理解技术如何塑造道德观念提供了重要启示。

参考文献

- [1]特德·姜.呼吸[M].耿辉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9:230-236.
- [2]Booth, “Why Ethical Criticism Can Never Be Simple,” 1988, p. 357
- [3]Jonas, Hans. The Imperative of Responsibility: In Search of an Ethics for the Technological Ag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4. Hans Jonas. The Imperative of Responsibility, P. 2. of the Preface.
- [4]Zuboff, Shoshana. Surveillance Capitalism and the Challenge of Collective Action. New Labor Forum. January 2019, 28 (1): 10 - 29.

作者简介:董威(1998),女,汉族,山东菏泽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英语语言文学。
盛世强(1996),男,汉族,山西大同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英语口语。